

## 編後語

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以「改良與革命的反思」為題，刊出香港中文大學第四屆「陳克文中國近代史講座」第二講「社會改良與社會革命：國共競爭下的道路選擇」的精彩內容，與讀者一同回顧和再思改良與革命的百年論爭。楊天石提出民國以來國民黨從社會改良主義蛻化至社會保守主義的觀點，以1926年南京國民政府推行的「二五減租」為例，指出由於遭受地主階級的強烈反對，最終只能在浙江省局部實行，無法在全國有效實踐；此一改革受阻可視為1949年中共革命興起、國民黨改良失敗的一個縮影。黃克武指出二十世紀中國在國民黨、共產黨以外，還有一群反蔣反共的自由主義者，被稱為「第三勢力」。在中共建政後，他們既不願留在大陸，亦不想前赴台灣，在1950、60年代曾經短暫在香港推動台港之間的互動，討論自由與平等、傳統與現代等議題，雖然最終無功而還，但仍值得後世緬懷。王奇生認為，清末以降中國歷經了三場革命：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和共產革命——前者可稱為小革命，後者則堪稱大革命（中間一場為混合型革命），即在政治革命之上繼續進行社會革命，乃至文化革命。由於「救亡圖存」的時代要求，清末的改良與革命之爭到五四以後實則已演變成「革命與革命」之爭。

本期不同欄目刊出數篇以人物為中心的文章，從迥異的角度折射出二十世紀以來改良與革命的洪流下，大時代中的歷史人物歷經的思想轉變；當事人不乏徬徨和掙扎，正所謂「英雄慣見亦常人」。宮陳細緻考察了晚年張元濟的思想言行，揭示深受傳統思想薰陶、閱歷世故的「文化老人」經歷1949年中共革命的洗禮後，在依違之間既認同又尷尬的表現。林盼以教育家蔣維喬為研究案例，指出新政權在團結、教育和改造的方針下，建立起以行政、社團等多種方式吸納知識份子的治理體系，成功讓舊知識精英逐步建立起對新政權的認同。曹嗣衡探討了《毛澤東語錄》於1966至1972年間在日本翻譯出版的傳播歷程，其中既有中國積極「輸出革命」的外在因素，亦有日本民間主動接受的內在背景，包括學習毛澤東的治國思想、反思日本公害問題等社會改良的客觀訴求。

最近，以「原子彈之父」為題材的《奧本海默》(Oppenheimer)在電影界以外引起熱烈討論。與坊間的影評不同，湯兆昇在二十世紀中葉西方物理學發展的脈絡下，將主人公以及同時代物理學家群體在推動物理學變革所作出的貢獻娓娓道來。科學家在實現劃時代的科技革命以後，如何面對嶄新的發明對人類帶來是福是禍的內心矛盾，相信是該電影對當今步入人工智能的世界最為及時的提醒和警示。